

中国—以色列
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

丢失的书

阿格农中短篇小说选

(以)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著
洪诗羽 林婧 王建国 杨扬
杨阳 张平 张之栋 钟志清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丢失的书

阿格农中短篇小说选

(以)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著

洪诗羽 林 婧 王建国 杨 扬
杨 阳 张 平 张之栋 钟志清 译
(按姓氏拼音顺序)

中国—以色列
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出版说明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在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而民心相通的前提是语言相通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为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2016年1月12日，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以色列外交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以色列外交部在文学和翻译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中以双方将在文学和翻译领域开展合作，中方将推荐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以色列翻译和出版，以方将推荐以色列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和出版，并启动出版领域内的多项合作。2017年春，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社组织中国和以色列两国专家

调研论证，启动了“中国—以色列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这也是外研社承接的第四个国家级图书互译项目。这一项目无疑将成为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也为中国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以色列的社会文化提供了契机。

以色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镌刻着强烈的民族记忆。我们本着经典性、人文性和时代性的原则，撷取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 20 部著作翻译出版，涉及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反映了以色列历史文化的总体风貌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虽经中外专家反复遴选，但要在以色列浩瀚的人文经典中选出 20 部，其过程恰似文海撷贝，难免挂一漏万。失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我们相信在中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有力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开启两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新篇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写于《丢失的书——阿格农中短篇小说选》出版之际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评判作家创作质量的唯一标准，但作为以色列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1888—1970）融合了犹太文学传统和欧洲文学传统的主题和结构，创造了新型的希伯来语小说，成功地反映了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犹太社会与文化变革的深广程度。他本人也被公认为20世纪希伯来语文学的杰出代表。当今依旧从事创作的以色列著名作家，如奥兹、约书亚、格罗斯曼、沙莱夫等人几乎无一例外、不同程度地承认阿格农对其创作的影响。

阿格农其人

阿格农生于原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即今天的波兰，原名施穆埃尔·约瑟夫·查兹克斯。从宗教及血缘关系上看，他出生在19世纪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之家。阿格农的父亲虽然曾经以经营皮货

为生，但却饱读诗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①，其家族同18世纪兴起于波兰、主张虔修与神秘主义的哈西德教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母亲家族属于米特纳盖德教派，即犹太教中坚持传统教义、反对18世纪中叶东欧的哈西德派教义的教派。这使得阿格农既有机会在家中实践东欧主流宗教生活，又有机会接触到欧洲文学和犹太启蒙运动以来创作的新希伯来文学作品，可以说受到了犹太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熏陶。阿格农自幼在犹太会堂接受传统教育，跟随父亲及私人教师学习《妥拉》（即《摩西五经》^②）、《塔木德》等犹太经典、拉比传说和哈西德文学，通晓《塔木德》及其评注，通晓犹太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迈蒙尼德的著作，并从母亲那里听到了大量德国文学中的故事。与此同时，他自己借助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阅读了犹太启蒙思想家撰写的著述；后来又学习了德文，通过德文阅读东欧文学，这为其日后在创作中表现神秘悠远的宗教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阿格农在文学创作上起步很早，从8岁时就开始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进行写作，15岁时开始发表意第绪语诗歌和希伯来语文章。

1907年（一说1908年），阿格农离开故乡小镇，踏上了远赴巴勒斯坦的旅程。在巴勒斯坦，他与第二代新移民的先驱者们相遇，他们居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忍受着疟疾和蛇蝎的困扰，在荒地上开垦耕作，对圣地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这种精神使阿格农深受感染，他虽然未亲身投入到劳动阵营之中，但却深爱巴勒斯坦这一犹太民族古老的发祥地。当时，他住在位于地中海岸边美丽的雅法老城，并且谋到了一份教职，为文学刊物做编辑助理。1908年，阿格农在希伯来语

① 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② 《摩西五经》，即《旧约》的前五篇，犹太教认为这五篇是摩西亲传，被视为该教的根本大典。

文学期刊《哈欧麦尔》上发表了第一篇希伯来语短篇小说《弃妇》，这篇小说应该说是阿格农在创作中试图切近希伯来文学传统的一个尝试。与此同时，阿格农继续攻读欧洲文学，他不穿戴正统派犹太教的服饰，也不遵从正统派犹太教的礼仪，但经常去耶路撒冷朝拜。在这一时期，著名希伯来文作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对他在巴勒斯坦的早期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1912年，阿格农离开巴勒斯坦去往柏林，其真正原因至今仍令学术界迷惑不解。从1912年到1924年，阿格农一直在德国各地迁徙、漂泊。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格肖姆·G.肖勒姆和犹太商人、大收藏家萨尔曼·绍尔肯。与绍尔肯的邂逅已经成为希伯来文学界的一段佳话。1915年，他们同去听柏林的哲学讲座，绍尔肯为小有名气的阿格农的渊博学识所吸引，阿格农又为绍尔肯熟谙德国和欧洲文学感到惊诧。在交往中，慧眼识才的绍尔肯意识到阿格农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定会前程远大，于是在大名鼎鼎的绍尔肯出版公司尚未开设之时，便夸下海口，许诺日后阿格农的任何作品均可以找绍尔肯发表。也许他们都没有想到，阿格农会在半个世纪之后一举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绍尔肯和阿格农所签订的出版契约使阿格农能够终生专注于艺术创作，不至于为出版而奔波，但是也致使他丧失了所有的著作版权，注定他一世清贫。在20世纪20年代《致妻子的信》中，阿格农曾揶揄自己能否用写作来养活妻儿。他后来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未给子女留下丰厚的遗产。

在德国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阿格农的父亲不幸去世，但阿格农却没能赶上葬礼，未能亲眼看到父亲下葬，这给阿格农的一生留下了很

大的遗憾，乃至在他日后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因延宕而错失良机的情结。此外，他与出身于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家庭的漂亮淑女爱斯特琳结婚，安家汉堡，生一子一女。除置身犹太学研究外，他还同著名诗人比亚利克及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过从甚密，出席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不幸的是，1924年阿格农家中失火，将所有书籍及一部未竟的小说手稿焚毁，他的许多作品从此便蕴含着毁灭与失落这一主题。

火灾过后，阿格农重返巴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一年后家眷随之而至。虽生存环境艰苦，但圣城耶路撒冷像道灵光赋予他温暖、力量及汨汨的创作文思。他重新恪守犹太教正统派教义，在精神上非常旷达超然，把家中失火解释成上帝对他的惩罚，原因在于他竟然忘记了故乡以色列。1929年，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的反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运动，阿格农的住房、图书、手稿又一次被毁于一旦，于是他在耶路撒冷塔勒皮约特区建起一座新宅，一直住到去世。

如果把阿格农放到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移民运动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阿格农选择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至少标志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需要把希伯来语当作创作与交流的手段这一趋势的认同。在他的作品中同时也认同的是犹太文化传统。阿格农曾经在自己论及希伯来语言神圣性的小说《味觉》中对现代文学与古代文本之间的关系做过诗意化的表达：当他读到《妥拉》、《先知书》、《圣著》、《密西拿》、律法与传说等用希伯来文写就的犹太经典文字时，不禁想起古代宝贵的民族财富多次被毁，只留存在记忆中时，内心充满了悲痛，这悲痛之情使他的心在颤抖。他在颤抖之中提笔写作，就像一个被从父亲的宫殿里流放出去的人，栖息在

自己搭建的小棚子中，用上帝能够听懂的唯一语言，诉说祖辈前贤家里的辉煌。在阿格农看来，象征祖辈辉煌的“宫殿”代表着神圣的希伯来传统，而现代作家的作品，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古代传统的世俗替代物，即他所说的“小棚子”。他一向大量使用囊括了丰富典故、具有深刻隐喻的希伯来语，并把现代希伯来文学视为古代文本的替代物，但在希伯来语变革的时代，他无法把希伯来语真正变成经典的载体，换句话说，他无法完全用古老的语言传播现代内容。而且，他也无法全面回避欧洲文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格农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既无时无刻不在切近着犹太宗教文化传统，又有别于那个传统，时时表现出一种现代意识。

阿格农的中短篇小说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给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1931）、《一个简单的故事》（1935）、《宿客》（1939）、《只是昨天》（1945）、《希拉》（阿格农去世后由其女儿埃蒙娜整理出版，1971）；中短篇小说集《大海深处》（1935）、《两个传说》（1966）、《二十一个短篇小说》（1970）、《丢失的书及其他短篇》（1995）等。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体大家，阿格农在创作鸿篇巨制的同时，也有许多中短篇佳品。他的中短篇小说，兼具内容与形式、文体与韵律的完美，将希伯来中短篇小说推向了“艺术的高度”。如前所示，阿格农既熟悉犹太文学传统，也熟悉欧洲文学传统和希伯来现代小说，经常把犹太经典文献与现代欧洲文学表现形式相结合，以凸显他对经典的继承与革新。阿格农的语言主要受《圣经》文学、拉比文学传统以

及德国浪漫派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传统的影响，不仅用典丰富、含蓄优美、意味深长，而且睿智幽默、妙趣横生，夹杂着大量的外来语，反讽意味很强，但在理解与翻译上难度很大，包括以色列文学系的学生有时都未免对阿格农望而却步。

《丢失的书——阿格农中短篇小说选》收入的15篇作品，除《沙山》《在她盛年之际》写于德国外，均写于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或建国后的以色列；小说背景基本上在以色列地与阿格农的故乡小镇之间转换。

《弃妇》在阿格农的创作中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不但是阿格农从流散地抵达巴勒斯坦后创作的第一篇希伯来语短篇小说，而且也是作家在文坛奠定自己声名之作。作家在发表这篇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阿格农”，与小说希伯来语标题“阿古诺特”属同一词根。20年代从欧洲重返巴勒斯坦不久，作家又把“阿格农”易为自己的姓氏。按希伯来大学已故教授戈尔绍恩·谢克德之说，阿格农在小说题目与他本人之间建构了一种关联，他延续着古代文学的一种传统，含蓄地表明他的人生就是对这篇作品的解说，正如小说是对他的人生所做的解说一样。

“阿古诺特”是“弃妇”或者“被遗弃女子”之意。按照犹太律法，“阿古诺特”指那些与丈夫分离的已婚女子，但因为丈夫生死不明，既不能跟丈夫离婚，又不能再嫁。小说首先描写了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四组或明显或潜在的受挫情感和失败的婚姻关系。

女主人公迪娜出身名门，其父阿赫阿扎尔十分富有，从流散地移居到圣城耶路撒冷。阿赫阿扎尔膝下无子，将唯一的女儿迪娜视为掌上明珠。按阿格农描述，迪娜自己也是集千般美德于一身的女孩，容

貌光彩照人，声音悦耳动听，举止谦逊温柔。等她到了谈婚论嫁之年，她的父亲向流散地中的所有国家派去信使，寻找能够与之般配的对象。数月后，信使们报告在波兰找到了一位出众的少年，一位研习《塔木德》的学生，出身高贵，才貌出众，虔敬，谦逊，是美德与善行的化身。这个青年人便是迪娜后来的丈夫以西结，他非但与迪娜没有任何感情基础，而且在波兰有自己深爱的姑娘，即他父亲女佣的女儿帕尔德丽。

迪娜的父亲为使未来的乘龙快婿能够在耶路撒冷赢得令人尊敬的学术地位，让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听他讲传犹太律法，便命人营造一座带有祈祷间的恢宏圣殿，让书记员抄写律法经卷，并命卓尔不凡的艺术家本·乌里制作盛放经卷的藏经橱^①。本·乌里在花园中的歌声吸引了迪娜，这歌声逐渐使迪娜对这个年轻的艺术家的萌生爱意。迪娜来到本·乌里的房里，在“魔鬼”的挑唆下，扬手打翻了已经造好的藏经橱，藏经橱从窗口落入花园。

迪娜打翻象征着神明降临的藏经橱，显然是犯下罪愆。尽管迪娜后来在向拉比坦白自己打翻藏经橱这一罪愆时得到了拉比的宽恕，拉比告诉她每位新娘在婚礼那天都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但她最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象征着艺术的工匠本·乌里离她而去，而象征着生活的丈夫以西结也与她离婚，她再次与父亲踏上流亡的旅程。以西结虽然离开了迪娜，但也不可能重新赢得失落的爱，曾经遭到他“遗弃”的帕尔德丽已经在波兰另嫁他人。

从作品中几对年轻人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到，《弃妇》表现出双重主题：即失落的爱与挫败的艺术。尽管我们通过文本阅读无法清晰地

^① 藏经橱，犹太教堂中用来存放经文的木器。

判断谁是犹太律法中所指的真正弃妇，但确实存在着因弃妇这一传统概念而造成的种种不和谐。也许在文本中表现出造成爱与艺术双重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犹太律法，而是在于个体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或者说由社会外力而导致的冲突。

小说与犹太经典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关联。一些主要名字均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原型。迪娜的原型无疑可以上溯到《圣经》中雅各和利亚的女儿底拿，一位未能得到幸福婚姻的女子。小说以哈西德故事中惯常沿用的“据记载”起句，在以色列人行为与上帝手上用来编织凝聚着所有恩惠与怜悯之意的祷巾用的一条德行之线之间建立关联，又遵循《旧约·雅歌》与《旧约·雅歌》评注的模式充满寓意地开篇，与希伯来文学、宗教经典《圣经》以及其他希伯来经典文献建立某种互文关系。作家没有停留在原始的希伯来文本《旧约·雅歌》对爱情的描写上，而是加进了后人的理解。欢快的相恋与痛苦的相思象征着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两种鲜明对照的关系。在这种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他强化大流散中的犹太人与上帝失之交臂的痛苦，以表明犹太人在大流散过程中所产生的痛苦的历史体验。而这种痛苦，便是他重新叙写小说故事时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就像他自己在开篇中所说：“一个来自圣地——愿它得到重建——的不寻常的故事……”

这个大故事叙述的当然不只是迪娜、本·乌里、以西结和帕尔德丽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并非单纯地演绎出女子遭到遗弃的悲剧主题，而是在探讨上帝与以色列、大流散与以色列、流亡与救赎乃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小说中的两个年轻女子，即迪娜和帕尔德丽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代表耶路撒冷与波兰（即以色列地和流散地）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属性。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没能找到自己

的意中人，都成为遭到遗弃的人，都相继选择了离去。迪娜与父亲在耻辱中离开了耶路撒冷，以西结回了波兰，本·乌里也被逐出，就连迪娜父亲和为迪娜主持婚礼的拉比也不例外。迪娜父亲从流散地来到圣城耶路撒冷，为在废墟中的重建尽绵薄之力，为造物主重新降临锡安地那天做准备。但是女儿婚姻的失败使之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所有的希望于是落空。拉比本人因批准迪娜和以西结的婚姻在梦中遭到应该流亡的判决，于是为救赎爱情中的弃儿也踏上了流亡之旅，而他的妻子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妇。

尽管小说的结尾扑朔迷离，但是整篇作品自始至终可以说是蕴含着一种思想，即人的行为决定命运。得不到爱，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遭到上帝的遗弃。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世纪的“道德小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恋人的角色分别可以在犹太人的历史主题中找到根源，即与以色列人离开先祖生活过的土地流亡异乡的命运产生某种呼应。由《弃妇》衍生出来的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犹太人与以色列地的关系的探讨，在日后阿格农的许多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在她盛年之际》应该是阿格农在德国期间创作的最好的短篇小说，透视出阿格农一向关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冲突的主题。小说可以说是一个犹太知识女性的回忆录，它采用第一人称，以一个名叫提尔莎·马扎尔的年轻女子的口吻展开叙述：

我的母亲在她盛年之际离世，年仅三十一岁。她的生命短暂而艰辛。离世前她整日坐在家中，几乎从不动弹。朋友和邻居很少来访，父亲也不邀请宾客。我们的家在悲伤中艰难维持，大门从来不向陌生人开放。我的母亲躺在床上，少言寡语。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沉默、忧伤、在盛年之际离开人世的犹太少妇的画像。这幅画像，堪称阿格农心目中犹太少妇的一幅经典作品，乃至数十年后阿格农在回忆同样英年早逝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母亲范妮娅时使用的仍然是一样的语言与口吻：“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不多，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显然，在这幅画面中，女性成为一个沉默的角色。同时，阿格农使用了与沉默有关的几个希伯来语词根，写母亲在世时，家中一片寂静，而母亲去世后那个冬天，家里寂静了七倍之多，衬托出一种令人窒息、没有生气的气氛。

与《弃妇》中的迪娜一样，《在她盛年之际》中的母亲利亚这个形象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原型。在《创世记》中，利亚作为拉班的长女，遵从父命与自己的表兄雅各同房，但是雅各心里喜欢的是利亚的妹妹拉结，爱拉结胜于爱利亚，失宠的利亚苦情满腹。阿格农笔下的利亚虽然与《圣经》中的利亚经历不同，但命运同样不幸。利亚本来与借宿家中的维也纳青年马扎尔产生恋情，但却不得不按照父母之命，嫁给了父亲眼中生活富有、可以托付终身的明茨为妻。尽管他们有一个女儿，但是，由于被剥夺了爱，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一个安息日前夜，她焚毁恋人给她的全部情书后，离开了人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小说视为书写女主人公在盛年之际得不到真正爱情而魂销香断的悲剧。

但是，小说并没有就此搁笔，而是通过小说叙述人——女儿提尔莎的努力来继续母亲的人生，提尔莎在母亲去世后立刻成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她在父亲的抚养下长大，从母亲女友那里得知了母亲与犹太历史学家、作家马扎尔的情感故事，逐渐对这个年龄与父亲相仿的男

人产生了兴趣与感情，最后义无反顾，嫁给了这位母亲的旧日恋人，可谓是完成了母亲的夙愿。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伯来文学专家班德的说法，这是阿格农有生以来初次并且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描写爱情得以实现，在不可逾越的力量面前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之所以称女儿的爱情赢得了表面的胜利，是因为她仅仅是实现了嫁给自己想嫁之人的愿望，而作品结尾，虽然没有详尽描述夫妻之间的裂痕，但已经暗示出怀孕的提尔莎对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感到厌倦，这一结局给主人公的命运笼罩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尼茨阿·本-多夫借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通过详细分析作品中提尔莎的梦境来审视她不安定的灵魂、觉醒过程以及她对现实产生的幻灭感、领悟与屈从，认为这篇作品虽然在阿格农的全部创作中具有独到之处，但遵循的是依然是爱得不到回报的阿格农范式。这一观点确实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在她盛年之际》的文本意义与社会意义。

阿格农是在德国写作这篇作品的。身在犹太启蒙运动的摇篮，德国的犹太女子应该是更多地接触了欧洲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把欧洲文明中的观念带到自己的民族内部，给自己的文化传统带来新的声音。随着犹太启蒙运动的东渐，东欧的女子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种新思潮的影响，尽管同德国的犹太女子相比，东欧的犹太女子与其文化传统一样表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时，东欧犹太人仍然保持着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子女婚姻的传统，在一个家庭中，男性仍旧可以主宰女性的命运，这一点在《在她盛年之际》中也得以体现，如提尔莎母亲的婚姻决策权掌握在提尔莎外公的手里，提尔莎本人也曾遇到媒人提婚的经历。在阿格农的笔下，提尔莎

便是生活在东欧犹太小村庄里一位受到一定程度文化启蒙的新女性，至少已经不再是像她母亲那样生活在犹太律法传统桎梏下的女子。她不仅能跟随父亲为她请的家庭教师学习希伯来语、《摩西五经》和祈祷书，而且被送到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师范学院，马扎尔就在那里任教。她敢于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情感，敢于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敢于主动向所爱的男人示爱，也嫁给了自己想嫁的男人。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提尔莎的父亲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势下答应了女儿的婚事，允婚实际上只是挽救女儿生命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父亲心悦诚服地接受婚事的一种表达，而社会习俗对待这门婚事也并不持赞成态度。换句话说，在当时的东欧社会，犹太女子依然缺乏话语权，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提尔莎选择马扎尔是出于真爱，还是出于对母亲情感的一种移情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尔莎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看到马扎尔，立即想到了自己死去的母亲，因为他移动双手的方式与母亲的姿势一模一样。从这个意义上看，她爱上母亲旧日情人并与之结婚的过程也许就是一个角色换位的过程，是在替母亲完成某种心愿。母亲在相思之情的困扰下死去，而她自己则从类似母亲得的一场大病中再生，象征着母亲生命的延续。然而在这个因果相承的链条上早已蕴含着某种不幸，抛开提尔莎与马扎尔婚姻本身的不幸，仅从自然发展过程上看，如果说母亲在盛年之际因得不到爱情而身亡，那么得到了爱情的女儿也许依然会在盛年之际失去爱情。这一预言潜在的悲剧含义在小说的结尾得以具体化，她望着自己的丈夫与父亲的面庞（二人年龄相仿），渴望痛哭，渴望在母亲的怀抱里痛哭一场。这种场面令人不禁发问，马扎尔究竟是提尔莎追求的恋人，还是已故母亲的幻影，至

此，小说几近达到了悲悯的极致。

华盛顿大学教授索阔洛夫·娜欧米认为，作为熟谙犹太文化传统的男作家，阿格农从女性的视角来揣摩女性的感受，表达女性的心声，其目的显然不是要单纯描述提尔莎母女的个人遭际，而是在关注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犹太世界的变革。让读者领略到犹太世界正面临着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变革。正是因为本文的女叙述人处于这样一个变革的年代，她才熟悉古代希伯来语文献，能够高水平地驾驭希伯来语，故而阿格农在创作中使用了很多《圣经》隐喻和意象，使犹太经典文化在当代世界留有余响。

《丢失的书——阿格农中短篇小说选》中收入的作品均非常精彩，但限于篇幅，无法逐一做文本细读，敬请读者海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钟志清

2019年1月于北京